

毛泽东《讲话》的历史命运及其现实意义

曹光章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摘要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当代中国文艺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文化都发生了重大长远的影响。70 多年间, 对于《讲话》精神的贯彻和实践、继承和发展, 构成了当代中国文艺和文化发展的一条清晰的、绵延不断的脉络。延安以及解放区文艺界通过对《讲话》精神的学习和贯彻, 在思想和行动上步调渐归一致, 真正发挥了“团结人民, 教育人民, 打击敌人, 消灭敌人”的作用, 为革命战争胜利作出巨大贡献。在《讲话》精神指导下, 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 同时也培育了无数优秀的人民艺术家。新中国成立到 60 年代前期, 《讲话》的贯彻和实践并非顺利, 其中包含了对错误思想的斗争和斗争过程中我们的失误。特别是《讲话》被“四人帮”歪曲利用, 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对于《讲话》的科学继承和发展才成为可能。十六大以来, 我们逐渐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关键还在于如何解决好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问题。

关键词 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 贯彻和实践; 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CN61-1487-(2013)12-0005-06

1942 年 5 月, 在延安整风期间, 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由文艺工作者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围绕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服务的问题, 发表了长篇讲话, 其中谈到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时代、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歌颂与暴露、普及与提高、世界观与文艺创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提出了革命文艺要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 文艺工作者要和工农兵相结合的结论, 从根本上回答了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等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之后, 对当代中国的文艺乃至整个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1992 年, 胡乔木就指出: “历史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50 年来中国文学艺术的整个历程与毛泽东的讲话密切相关。”^[1]2012 年, 李长春同志在纪念《讲话》发表 70 周年座谈会上也强调《讲话》“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是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和文艺工作的重要里程碑, 也对整个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和胜利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指导作用; 不仅将我国革命文艺运动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也为我们今天探索和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南。”^[2]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之际, 回溯《讲话》发表后的历史命运, 分析它对于党领导的文艺工作以至整个文化工作所产生的历史影响, 对于我们搞清楚如何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坚持毛泽东的文化思想, 用以分析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座谈会和《讲话》的历史背景

从 1942 年春开始, 毛泽东在全党范围内领导开展了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毛泽东明确提出, 这次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 反对宗派主义以

整顿党风, 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3]⁸¹² 虽然整风运动经过了充分的准备, 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已经达成了共识, 但是, 当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开展起来的时候, 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主要反映在延安文艺界中。”^[4]³³⁷ “如对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 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上, 或者脱离政治。对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 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 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如对写光明写黑暗的问题, 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 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 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都盛极一时。”^[5]⁴⁴⁹ 这种现象引起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注意。在经过充分调查研究, 对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有了充分了解之后, 中央决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的《讲话》主要就是针对上述问题而展开的。毛泽东把文艺界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归结为文艺工作者“头脑中间还保存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6]⁹⁰ 针对这一思想问题, 毛泽东把《讲话》要阐述的问题集中概括为“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讲话》即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展开。

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 有着深刻长远的历史原因。说到底, 延安文艺界当时存在的问题, 是近代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问题在延安时期的具体表现。自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文化开始重新审视和反思自身, 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开端。接下来, 围绕古今问题、中西问题, 思想界进行着关于发展道路和方向问题的持久争论和艰难选择。在这一过程中, 知识界、思想界长期争论, 却终无定论。另一方面,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

人民群众依然蜗居在传统的文化精神家园中,丝毫没有触动。人民群众作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主体部分尚未觉醒。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中国文化变革面临的态势。五四运动开启了文化启蒙与群众运动结合的第一步,但也仅仅是开端,也仅仅是昭示了新道路、新方向的曙光。这样的方向和道路还没有在思想知识界成为共识,更没有系统、成熟的理论表达。多数的进步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都还不懂得如何与文化运动和群众运动相结合。

1941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主张,为中国新的文化发展道路和方向做出了科学的界定: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个方向虽然提出来了,但是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我们党“对于文学艺术工作,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很好的决定”。^{[6]87}也就是说,在具体工作中,如何贯彻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组织和教育文化队伍,开展文艺创作,都缺少明确的政策。特别是针对抗战之后大批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如何开展工作还缺少经验。在抗战初期,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来来去去,听其自便”,“我们对文化人的工作,多半只着重于招待、优待他们,而对于在思想上团结他们,教育他们,做得非常不够。”即便在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之后,党的文化工作也还没有充分注意到对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而是强调了文化人的特点,对他们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5]449}这就使得多数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在思想上都没有经历过一个改造的过程,还深深地受着原来所形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讲话》发表之后,关于整风运动的性质,中央特别强调了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比如,1942年6月5日《解放日报》的社论中说:“整顿三风运动的性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个运动,是要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不但要克服旧有的三风不正的残余,而且还要克服新的小资产阶级的不正确思想。”^{[7]319}

二、座谈会之后对《讲话》精神的贯彻和落实

“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把延安文艺家们的思想引入一个新的境界。文艺界的整风虽然在座谈会之前就已开始,但真正开展起来,则是在座谈会之后。从这时起,文艺界出现了一种从来没有的自我反省、相互批评的风气。”^[1]各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在学习、讨论《讲话》精神,进行自我反省和相互批评的同时,也开始思考如何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和实践《讲话》对革命文艺提出的要求。5月29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召集剧协、音协、美协等团体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实行文化人战时动员,号召大家都到部队去,到地方民兵队伍里去,开展“文化入伍”运动。7月9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又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关于艺术作品的评选委员会,奖励反映边区工农兵生活的艺术作品,奖金从优。^{[8]100}9月,延安文化俱乐部开始在延安街头举办“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等大型墙报。

1943年春节开始,延安和各根据地掀起了大规模的“秧歌运动”。1943年3月10日,为贯彻《讲话》精神,中组部和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在延安召文艺工作者会议,为即将下基层工作的同志送行。陈云作《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的讲话,论述了文艺工作者的党性要求,并要求文艺工作者克服小资产阶级情绪,学习实际的政治,了解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刘少奇也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直接向实际学习,直接从改造实际中学习。这些讲话都是对毛泽东《讲话》的具体阐发和运用。特别是陈云的讲话,针对文化人以什么资格做党员和文化人如何正确估计自己两个问题的论述,使文艺工作者“明白无误”地“了解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是第一性的,是我们的写作源泉”。^{[9]120}这次会议之后,延安各剧团几乎全部下乡演出,“这是延安文艺界的一个重大的举动,在中国文艺运动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的广阔的生活天地,给作家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使解放区的文学艺术呈现出崭新的面貌。”^[1]

1943年10月19日,《讲话》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1944年1月,《讲话》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在国统区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共南方局在董必武领导下,组织了对《讲话》精神的学习,要求共产党员文艺工作者要深刻认识思想改造的意义,以准备迎接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不过,“在重庆那样的特殊环境和条件下,主要是学习《讲话》的精神,作为不断改造思想的武器。但要具体贯彻执行深入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不可能的。”^{[10]415}为此,不少进步文艺工作者学习了讲话之后,要求立刻到延安或解放区,参加“真正的”革命行列。

通过对《讲话》精神的学习和贯彻,“文艺界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步调渐渐归于一致。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方向,成为众所归趋的道路。”^{[11]101}在《讲话》引导下,产生了秧歌剧《兄妹开荒》,新歌剧《白毛女》,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长篇新诗《王贵与李香香》等大批深受工农兵群众喜爱、影响巨大的文学艺术作品。延安文艺运动真正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为革命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成功的文艺实践,使得《讲话》获得了极高的历史地位,并逐渐被提高和总结为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文艺思想之后,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新发展。1943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决定》,首次以党的文件的形式对《讲话》做出评价,指出,《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并要求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1944年,周扬在《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的长篇序言中指出《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

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文艺理论的正确。”^{[12][112]}这是《讲话》第一次被提高到马克思主义文艺发展史的高度来予以评价。此外,郭沫若、茅盾、夏衍等也都撰写文章,介绍《讲话》内容,畅谈学习体会。《讲话》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著作的历史地位得到了理论的阐发和说明。

三、新中国成立后前 17 年对《讲话》的贯彻和实践

1949 年 7 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毛泽东的贺电和讲话、朱德的祝词、周恩来的政治报告、郭沫若的总报告、茅盾的报告等,都坚持和强调了《讲话》所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周恩来的报告中专门讲到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要求文艺工作者继续熟悉工人、农民和士兵,主要的力量应该放在反映工农兵身上,不然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可能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劳动人民。周扬的报告则提得十分明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12][371]}经过第一次文代会,《讲话》理所当然地被确立为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指导思想。1953 年 9 月 10 日,中共文化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目前文化艺术工作状况和今后改进意见的报告》,1954 年 1 月 8 日,中共中央批准这个报告,并在批语中说:文化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积极发展适合群众需要的新的文学艺术和电影的创作,应抓紧对文艺创作(包括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等)的领导,引导作家按照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方向 and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前进。这个批示提出了过渡时期党领导文化艺术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坚持了《讲话》所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把它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结合起来,对于繁荣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具有重要指导作用。1962 年《讲话》发表 20 周年之际,广大文艺工作者向全国发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口号,号召文艺工作者自觉地以《讲话》精神为指导,进行新时代的艺术创作。

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以后,文化上如何对待传统的、西方的文化资源问题,也就是古今、中西问题,又一次摆在共产党人面前。这一问题就是:在新的形势和任务下,如何使传统的、西方的文化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用,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的思考,毛泽东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及双百方针等理念和原则。此外,伴随着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而提出了“科学文化现代化”的远大任务。上述种种,都体现着共产党人在革命胜利后,在新中国奠基、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背景下,对于文化发展方针、路线和目标的探索,其中始终贯穿着《讲话》精神的光芒。

在《讲话》指导下,新中国的文艺创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新的文化艺术代替旧的、腐朽的、落后的文化艺术,到 60 年代前期,涌现了《创业史》《林海雪原》《青春之歌》

《铁道游击队》《智取华山》《渡江侦察记》《上甘岭》《红旗谱》《红色娘子军》《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小兵张嘎》《白求恩大夫》《冰山上的来客》《霓虹灯下的哨兵》《英雄儿女》《雷锋》《红岩》《敌后武工队》《洪湖赤卫队》《江姐》《长征组歌》等等众多的文学、电影和戏剧作品,创造了新中国文艺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历史篇章。同时,也培育了无数优秀的人民艺术家。1987 年 5 月,王震在纪念《讲话》45 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讲话》发表以后成长起来的、卓有成绩的中国作家,都曾程度不同地受到过它的教育和影响。^[13]这一估计,不但对于延安时期的文艺工作者适用,用在五六十年代涌现出的人民艺术家身上,也是十分恰当的。《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曾深情地说:《讲话》是部划时代的宏伟巨著。我个人如果不是受《讲话》的影响,比较认真地刻苦地改造世界观、人生观,我想是不会写出《青春之歌》的。

新中国成立后到 60 年代前期,《讲话》的贯彻和实践也并非十分顺利,其中包含着对错误思想的斗争,也包含着斗争过程中我们的失误。

新中国成立之后,思想文艺界的队伍又面临新的重大变化,大批未经改造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参加了革命文艺的队伍。党对他们的思想状况的基本判断是:“从他们中间带来了一些旧社会的意识残余和非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一部分来自老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在进入城市以后,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影响,迷失了原来的方向,而文艺界的许多领导同志又放弃了或懈怠于思想领导的工作,陷入事务主义的泥坑。这就使文艺工作中产生了相当严重的思想混乱的现象,使文艺创作缺乏生气,使文艺工作不能有效地担负起它应有的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前进的重大任务。”^[14]为此,1951 年,中共中央在文艺界开展一次整风学习运动,通过“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发扬正确思想,整顿文艺工作,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6][138]}还有另一方面的情况,“和上述倾向看来似乎相反,而实际上也是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便是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主要地是由于庸俗地了解文艺的政治任务而来的。这类作品,除了搬拾来一些口号和概念之外,空无所有。它的人物是没有血肉没有性格的,它的内容是缺乏生活的。它只是把肤浅的政治概念和公式化的故事粗糙地揉合在一起。它既不是现实生活的深刻的反映,因此,也就不会对群众产生真正的教育作用。”^[14]

这样的两种倾向和问题,毛泽东的《讲话》中都已十分充分地讲到了,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依然不时表现出来。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不久,毛泽东就指出:“现在是过渡时期,我看这一时期在中国要五十年,这五十年是很麻烦的,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家和工人农民结合的过程。在此期间,有点麻烦,出点乱子,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我们

要慢慢地来,要进行宣传解释,光是写几篇文章作几次演说办不了事,一定要具体地一步一步地来,没有一次就成功那样容易的事。^{[6]93}这是一种冷静、客观的估计。不过,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开始,逐渐走向左倾,毛泽东对于文艺界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问题,显得越来越急躁。以致在1957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中,发动了对思想文艺界的过火批判,丁玲、陈企霞被错误认定为“反党集团”,大批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到这时,毛泽东才感到比较满意:在我国,在1957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戴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功夫可以完成的。但是基本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展示可以在这条道路上纵横驰骋了。”^{[15]167}

然而,后来的历史发展并没有成为毛泽东所期望的样子,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并没有由此走向广泛的发展道路,而是从这时起越来越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尽管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中,党的路线总的来说是正确的。至于文艺工作方面,也如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所说的,错误是有的,但17年的文艺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可以说,17年间,《讲话》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方向得到了基本的坚持,这正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文艺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十年“文革”期间,在“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讲话》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在口头上、意识形态上,依然被作为文艺工作的方向,但是,在“左”倾思想路线的影响下,不可能真正解决文化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也就不可能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讲话》中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时代”、“文艺与生活”、“形式与内容”的科学内容,都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运用。《讲话》甚至被极“左”化阐释,被“四人帮”拿来当作是批“黑线文艺专政论”的理论依据,被歪曲化利用,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这样错误地对待《讲话》,当然是为错误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四、新时期对《讲话》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文革”结束后,历史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时期。对于《讲话》的态度和研究,同样也首先经历了一个拨乱反正的阶段。1977年是《讲话》发表35周年。《红旗》杂志、《文汇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等都发表了文章。这些文章主要还是停留在批判和肃清四人帮流毒的层面上,反对从“左”的方面歪曲《讲话》精神。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于《讲话》的科学继承和发展才成为可能。1979年10月,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是《讲话》发表之后,对于《讲话》精神的第一次重要的丰富和发展。其中关于党的领导和文艺工作者的

关系、政治和文艺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意义重大。邓小平的祝词,继承了《讲话》关于文艺要服务于人民的根本方向,又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阐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以科学的态度研究《讲话》提供了理论依据。1981年8月,胡乔木在中宣部召集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要求作家深入到生活里面去,深入到群众里面去,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动摇的。但是,“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关于把具有社会的人性完全归结为阶级性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此,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要坚决加以维护和发展,对于它的某些不正确方面不要重蹈覆辙。^{[16]493}贺敬之也明确提出,我们对待延安文艺的成就和经验既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阶级斗争虽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已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在这种条件下,就不能照搬针对当时情况的论断原封不动地用于今天。

在提倡以科学态度对待《讲话》的同时,也出现了否定《讲话》、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现象。这突出表现在8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期间,特别是1989年,发表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提出,毛泽东“用的是比‘五四’远远落后得多的思想理论武器”,结果“彻底埋葬了‘五四’的全部精神遗产,使中国社会倒退到‘五四’以前的文化状态中去”,毛泽东文艺思想是“阴谋文艺”的根子,“给当代文坛注入了不安定因素”,因此要“总体性推倒重建等等。这些言论,针对《讲话》而发,但是其攻击目标则是整个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甚至是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针对上述错误言论,1990年5月,中国延安文艺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等15个单位和团体,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联合召开《讲话》发表48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就如何沿着《讲话》的正确道路,端正文艺方向,整顿文艺队伍,深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应对“精英”们的挑战等问题展开讨论。李希凡在闭幕词中说:真要使广大文艺工作者都回到社会主义文艺方向上来,深入开展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那斗争将是持久的。”^{[17]41}

90年代以来,我们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特别是十六大以来,逐渐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看起来,今天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布局已与延安时期、建国之后大不相同。但是,《讲话》的核心立场原则始终没有改变,只是为人民服务的方式随着时代条件的发

展产生了巨大改变。在文化内容上,文学艺术作品的主要内容不再是反映阶级斗争、革命需要,而是在强调弘扬主旋律的前提下,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读书、学习、陶冶情操、提升素质以及休闲娱乐等多重文化需求。在文化产品生产和供给方式上,改变了过去主要是按计划、统一生产和供给的模式,采取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产品无偿供给与个性化文化消费市场供给相结合的方式。所以,过去只有文化事业,现在既有文化事业,也有文化产业。具体采取的模式就是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繁荣文化市场、发展文化产业相结合。两翼齐飞,两轮齐驱。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对于延安讲话精神的传承和创新: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始终没有改变,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但是如何为人民服务,服务的途径是怎样的?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筑了崭新的服务体系,使更多的百姓更充分地享受来自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文化服务。因此,改变了的只是服务群众的方式。2012年,李长春同志在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鲜明地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讲话》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2]

五、《讲话》的现实意义

同多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一样,《讲话》发表后在70多年的时间长河中经历了曲折的历史命运。在被用以指导文艺实践的过程中,它取得过成功的经验,也遭遇过严重的挫折。对于成功的经验,应该归功于《讲话》,归功于它准确科学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艺工作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并解决了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对于所经历的挫折,责任在于我们没有采取科学的态度来继承和运用《讲话》所体现的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在《讲话》发表后的延安文艺时期,它对于文艺实践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一纸雄文定天下。之所以定天下,首先是它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基本原理,蕴涵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坚定地站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正确立场上。更重要的是,它对于当时的现实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对于文艺运动中的问题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并且提出了系统的、可行的解决方法。这就是文艺工作者要走到群众中去,与工农兵相融合。我们今天来学习《讲话》,不应该苛求《讲话》要完全适应今天的现实,能够对今天的现实有直接的针对性。而是学习《讲话》所体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能够真正地面对实际问题,把实际问题研究和分析透彻,并且有勇气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提出正确的、可行的路径和方法。

在今天,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当然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如何解决好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存在多个社会阶层、寻求不同社会阶层和谐共处的时代,团结一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各个社会阶层共同的目标。那么,在

这样的社会条件和目标任务之下,文艺为人民服务主要应该是为哪些人服务?人民的主体是谁?我们的文艺作品有没有很好地反映他们的现实生活,以及他们由自己的现实生活中产生出来的思想和情感,意志和追求?如果没有的话,该如何改进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

对照今天的文艺发展现状,不能不说,能够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农民现实生活的作品太少太少了。各种作品中越来越多地充斥着所谓“精英”、“成功人士”、“高富帅”、“白富美”的形象。在这类作品中,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被虚无化,他们的劳动和人生价值得不到肯定。比如,有一部反映医患关系的电视剧,选题按说是不错的,切中当下医患关系冲突的现实,但是帅气、靓丽的男女主角完全把这样一个严肃话题演绎成了时尚偶像剧。其中,还刻画了一个愚笨可笑的农民工形象作为男女主角施舍善意的陪衬物。试想,我们的农民工兄弟看了会作何感想?他们在城市中的现实生活已委实不易,而艺术作品中又这样来刻画他们,那么,他们会对自己的身份、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劳动感到骄傲吗,会对自己的人生产生肯定吗?

如果说,毛泽东毕生的文化追求,是要让人民群众在文化上高大起来、自信起来,如果说《讲话》发表后曾经非常成功地发挥着这样的作用。那么,今天恰恰有太多的作品,正在把广大的普通群众矮化,使他们矮小下去,卑微下去!这是需要我们深刻反思的。

参考文献:

- [1] 胡乔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J].中华魂,2012,(8).
- [2] 李长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讲话》精神 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R].党建,2012,(6).
-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1.
- [4] 金冲及,陈群.陈云传(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 [5] 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M].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 [6] 毛泽东.毛泽东文艺论集[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8] 第四次文代会筹备组起草组,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理论政策研究室.六十年文艺大事记(1919—1979)(未定稿)[M].1979.
- [9] 艾克恩.延安文艺回忆录[M].草明:五月的延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 [10]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抗战文艺运动[M].张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与学习.重庆出版社,1989.
- [11] 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12.
- [12] 周扬.周扬文艺论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 [13] 王震.满腔热情地对待人民事业[N].(1987年5月10日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5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7-5-23. (下转第26页)

2009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正式对司法部、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上报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进行立项。同年年底财政部安排彩票公益金5000万元专门开展针对农民工、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与妇女家庭权益的法律援助服务。2010年彩票公益金专项资金支持也是5000万,2011年资助额度上升为1亿元,2012年资助额度保持1亿元,资料来源法律援助基金会项目年度报告。

2002年中国残联维权部成立,随后各地各级残联陆续成立维权部门,逐渐形成残联主导的残障者维权保障的自有模式和特色。

即肇始于青岛的优先、优质和优惠服务。

例如2008年6月4日《司法部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发7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残疾人法制宣传、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司发通[2008]98号)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下数据来自不同部门组织,作者并不清楚这些数据之间是否存在重复或交叉的关系,这里就是初步呈现数据而已,对各类数据的具体分析情况还有待深入研究,并不是本文的讨论内容。

数据来源:包括中国法律援助网,最近三年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编《中国法律援助年鉴》等资料。

残联系统资料来自历年事业公报,作者没有就司法行政系统统计数据与残联系统统计数据是否存在重复、或者两者有何种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调研,特此声明。

数据来源:年度残疾人事业统计公报2006-2012年,中国政府网、中国残联网站。

- ① 数据来源:最近三年残疾人事业统计公报。
- ② 2008年九部门组织发起建立的协调议事机构。
- ③ 资料来源:各年度全国残疾人状况及小康进程监测报告,来自中国政府网、中国残联网站。
- ④ 根据对中国残联一资深人士的非正式访问,中国残联维权部的预算已几年都没有增加过了,获得外界资助的项目资金也很难使用。同时政法类民间组织的设立需要司法行政部门做业务主管,所以残联系统在残疾人法律援助或服务类机构的培育上难以有所作为。
- ⑤ 这些年有一些社会律所或律师积极为残疾人维权,但是本文这里强调的是由于管理机制和政策落实不到位,制度化扶持下出现的机构并没有。

参考文献:

- [1] 陈明义,郁贝红.路在何方——福建省福州市残疾人法律援助及优惠政策实施调查[J].中国残疾人,2003,(3).
- [2]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办公室,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报告[R].华夏出版社,2008.
- [3] 冯祥武.论法律援助对象之学理分类[J].广西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1-4,(2).

- [4] 马棚生.当代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M].人民出版社,2010-8.
- [5] 柳明月.浅议我国残疾人法律援助机制的问题及对策[J].时代教育,2012,(5).
- [6] 林莉红,黄启辉.民间法律援助与政府法律援助之关系研究[J].环球法律评论,2005,(6).
- [7] 林莉红.民间组织合法性问题的法律学解析——以民间法律援助组织为视角[J].中国法学,2006,(1).
- [8] 孟艳华,王远.河南省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实践与思考[J].人才资源开发,2012,(7).
- [9] 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编.2009中国法律援助年鉴[M].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9.
- [10] 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编.2010中国法律援助年鉴[M].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9.
- [11] 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编.2011中国法律援助年鉴[M].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10.
- [12] 盛钢.论我国残疾人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J].法制与社会,2007,(1).
- [13] 孙振中.残疾人法律援助的价值取向[J].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9,(1).
- [14] 王长红.残疾职工的权益保护亟待加强——关于北京市残疾人法律需求现状的调研报告[J].中国职工教育,2007,(2).
- [15] 吴胜利.残疾人法律援助制度中国家责任的体现[J].法制与社会,2007,(8).
- [16] 赵兴宏,李玮.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及其法律援助[J].社会科学辑刊,2005,(4).
- [17] 张耕.中国法律援助制度诞生的前前后后[M].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
- [18] 张圣林.论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残疾人,2005,(10).
- [19] 张中.弱势群体的法律救助——法律援助服务及其质量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1.
- [20] 中国残联两个体系建设办公室编.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学习读本[M].华夏出版社,2010-5.
- [21]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编.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辅导读本[M].华夏出版社,2011-5.
- [22]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2010-2012年度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资料(内部).

作者简介:李敬(1976—),女,上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法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残障社会政策和法律。

(责任编辑 陈合营)

(上接第9页)

- [14] 《人民日报》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纪念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N].人民日报,1952-5-23.
- [15] 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历史的丰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文化卷)[M].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 [16] 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2012.
- [17] 艾克恩.延安城头望柳青——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学习文集[M].李希凡:用<讲话>精神抓好整顿与繁荣.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曹光章(1972—),男,山东省利津县人,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研究。

(责任编辑 李直)